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生存选择

沈冬欢

(厦门大学 外文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系, 福建 厦门 363000)

摘 要:米兰·昆德拉通过小说中四位主人公或“轻”或“重”的生存选择展现了人类存在的荒谬性和不确定性。在他看来,人类生存选择的多种可能性,主要源于生存意义的相对性和偶然性以及生命历程的不可重复性和差异性。正因如此,昆德拉在肯定人类生存选择的自由的同时,也对人类的存在持有怀疑态度。

关键词:生存选择;轻与重;可能性;怀疑态度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219 (2014) 07-0056-03

彼得·库西(Peter Kussi)曾不无幽默地说过,“米兰·昆德拉写小说就是为了提问题”^{[1]p206}。这句话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小说一开篇,昆德拉便就人类的存在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重便真的残酷,而轻便真的美丽?”“那么,到底选择什么?是重还是轻?”“何为正,是重还是轻?”^{[2]p5-6}可以说,人类的生存及其选择,是昆德拉作品的根本落脚点。以上问题使读者将关注点聚焦于人类的生存选择及境遇,并使得“轻与重”成为了小说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正如昆德拉在小说开头所阐释的那样,“重”与尼采所说的“永恒轮回”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切事物都在无休无止地重演下去,因此它们都有着永恒的不可改变的必然性和意义。与“最沉重的负担”相反,“轻”则代表着“负担完全消失”,从而导致生存“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2]p5}。由此,我们不禁要问:昆德拉自身对于人类的存在抱有何种态度?换言之,轻与重,哪一种才是他所倾向的生存方式?

要回答以上问题,我们需要从昆德拉在小说人物身上所做的生存性研究入手,由此观照几个人物的生存境况及选择。在这里,之所以用“研究(investigation)”一词,是因为昆德拉曾将小说定义为“在特定情况下对真实与假定的存在可能性的研究”^{[3]p67}。同时,他认为,小说家作为研究者,为了探索这些可能性,应将它们分别运用于每一位人物的塑造。正如多琳·M·塔洛克所说,“每一个个体的存在方式都取决于他的选择行为”^{[4]p41}。因此,我们需要深入探讨小说中主要人物的生存困境,由此观察他们生存选择。

收稿日期: 2014 - 03 - 10

作者简介:沈冬欢(1990 -),女,福建漳州人,厦门大学外文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56

一 多种可能性:轻重之间的艰难选择

小说一开始,托马斯作为“轻”派代表,被描绘成一个向往自由惧怕责任的人。为了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他为自己立下了“三三原则”,即与他的情妇们轮番见面,不涉及任何感情或责任,以保持长久的“性友谊。”然而,特蕾莎毫无预兆地闯进他的生命中,一时间将他置于自由与责任的两难境地。对他而言,特蕾莎如同一个被放在涂了树脂的篮子里顺水漂来的孩子,需要他的保护与照料。这使他不得不违反自己的“轻”原则,承担责任,娶她为妻。然而,有了家庭的他却仍然无法放弃之前的生活模式,继续与各种各样的女人保持关系。原因之一,可能是特蕾莎的爱太过沉重,以至于托马斯需要时不时地享受“温馨的生命之轻”,以便使自己逃离一切形式的重压于身上的责任。^{[2]p36}

与托马斯相反,特蕾莎则过着一种相当沉重的生活,相信每件事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并企图寻找这些意义。当遇见托马斯时,她将相遇过程中的六个巧合(书、贝多芬、数字六、小公园的黄色长凳等)看作是命中注定。然而,特蕾莎眼中的“非如此不可”在托马斯看来却是“别样亦可。”他认为,他们的爱源于六个随机的事件,因而显得无足轻重。两者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可在萨特的思想中得到解释。萨特认为,正如世界的意义由人们赋予,理想本身没有客观意义,只有当它们被人们选择时,才具有了价值。^{[4]p42}此外,特蕾莎执着地追求灵肉和谐统一,认为只有它才能体现自我的真实存在。然而,现实却无时无刻不在向她证明灵与肉不可调和的两重性和矛盾性:托马斯虽深爱着她却可同时与许多女人发生肉体关系;当她试图搁置灵魂,尝试肉体的放纵,虽然出现了肉体沉醉,却终未产生爱情。^{[5]p77}可以说,在性爱两分的价值观念面前,我们看到了一个不断挣扎而几近崩溃的特蕾莎。

同样的,弗兰茨也承担着沉重的包袱与责任。在他看来,“忠诚是第一美德,使我们的生命完整统一。若没有忠诚,人生就分散成千万个转瞬即逝的印迹”^{[2]P7}。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婚姻不幸,他违背了自己对忠诚的信仰而与萨比娜发展了婚外情。这使他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出于对家庭的责任,他小心翼翼地维持婚姻。另一方面,他又担心萨比娜会因为他们的地下感情而感到沮丧。直到与萨比娜相爱了九个月后,他才下定决心离开妻子,光明正大地与萨比娜在一起。弗兰茨以为放弃一切与萨比娜在一起会令她欣喜与感动。但他不知道,真实而毫无隐私的生活并非萨比娜所向往,这么做恰恰促使萨比娜离开了他。然而,萨比娜的离开并没有使他停下追逐“生命之重”的脚步。他不难过,因为“萨比娜的人不在根本不像他所以为的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她在他生命当中留下的那道灿烂而神奇的印迹,无人可以夺走”^{[2]P141}。为了坚守自己对萨比娜的忠诚,他参加游行示威,拥护自由和正义,坚信自己能从中创造出生命的价值。^{[3]P73}

或许萨比娜才是书中唯一一个完全代表“生命之轻”的人物。带着对自由的热爱与向往,她在自己的生命中注入了各种各样的“背叛”,不断地“摆脱原位,投向未知”:在父亲的高压管制下,她渴望背叛这个典型的父权家庭,背叛父亲令人窒息的控制,因而喜欢上父亲所取笑的毕加索和立体派;之后,她又嫁给一个父亲无法接受的二流演员;父母去世以后,她又背叛了丈夫和婚姻;甚至在与弗兰茨的关系中,当他们终于能够公开恋情时,无法承担随之而来的责任的她再一次选择了背叛——不顾弗兰茨为她做出的牺牲而果断离开他。这一系列“背叛”实际上反映了萨比娜在极权统治王国里对“媚俗”的挣扎与反抗。“在极权的媚俗之王国,总是先有答案并排除一切新问题。”^{[2]P303}追求自由的她毫无疑问地站在了“媚俗”的对立面,不顾一切地试图逃离人们要强加在她生活和作品上的媚俗。正因如此,她不断践行自己的“背叛”原则,离开捷克去往瑞士,之后又辗转转到美国。然而,一次又一次的逃离并没有使她感受到“生命之轻”的喜悦。相反,最终,她发现自己的生活中变得毫无意义,只剩下一片虚无,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背叛。

二 怀疑与不确定:存在主义视角下的人类存在

正如库西所观察,“昆德拉用自己的怀疑态度告诉读者每个人都有错误的信仰”^{[1]P207}。在我们看来,小说中的主人公似乎都过着不幸的生活:托马斯爱上了特蕾莎,却发现自己昔日轻松自由的生活从此充满了负担与责任;特蕾莎试图寻找爱和生命、灵与肉的意义,却最终被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所打败;弗兰茨决心信守忠诚与真理,却恰恰违背了它们而最终失去了家庭和萨比娜;而萨比娜,虽然成为全书唯一活到最后的主人公,却在背叛了她的父亲、爱人和国家后遭受着无尽的空虚与寂寞的折磨。由于生活的不如意,这些

主人公常常对自己的选择产生怀疑,思考着如果选择不同,结果是否也会不一样。通过人物的自我质疑,昆德拉将一系列问题抛给了读者:如果托马斯当初没有回到特蕾莎身边,如果特蕾莎和弗兰茨都放弃寻找生命的意义并接受“生命之轻”,如果萨比娜没有背叛家人、爱人和国家,他们的结局会怎样?这些人物的生存境况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每一种生存方式都是一种生存的可能性,其本身并无高低好坏之分,以至于我们无法判断哪一种生活方式更好。

在此,我们不禁要问,昆德拉为何对人类的生存选择持怀疑态度?为何人类无法知晓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由于这部作品一直以来被视为存在主义思想的代表作,我们可以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存在具有相对性。塔洛克曾说过,存在特指人类的生存模式。换言之,存在主义者着眼于人类境况的研究,尤其关注人作为个体在世界这个大背景下的存在方式。^{[4]P32}他们强调生存意义的主观性,即人们在做出判断时往往基于自己的个人体验和感受而非外在事实。这一观点否认事物的客观性,恰恰与后现代主义中对绝对真理和客观认识的否定相呼应。因此,存在主义者倾向于从相对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同时,存在也具有偶然性。在昆德拉看来,世界本身就是一个荒谬的存在。而人作为存在的主体,其生命轨迹是偶然地抛到世界上的,因而人的每一次必然性的选择都隐藏在偶然之内。^{[6]P58}由此,人类存在的相对性和偶然性在某种程度上便解释了为何在“轻与重”的问题上,主人公们生存选择及判断的荒谬性和不确定性。

除了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人类生存选择的不确定性还来源于对“永劫回归”这一信仰的否定。换言之,生命的历程具有不可重复性。正如昆德拉所说,“生活是一张没有什么目的的草图,最终也不会成为一幅图画。”在他看来,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每个人都经历着生活中突然来临的一切,毫无防备。我们即没有排练,也无法重来,更不能回到过去。因此,“我们既不能把它与我们以前的生活相比较,也无法使其完美之后再来度过。”没有比较,我们便无法判断自己的选择究竟是对是错。

事实上,我们不仅无法让自己重新经历同一事件做出比较,更无法比较不同的人的经历。如萨特而言,世界的意义源于它与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4]P38}由于人们的生存境况各不相同,其产生的意义也截然不同。例如,我们不能仅仅通过比较特蕾莎因“生命之重”而遭受的痛苦和萨比娜因“生命之轻”而拥有的自由来断言“重”是悲惨的而“轻”是美好的。两者由于迥异的儿时经历、教育背景和生活态度而持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因而硬生生地比较她们的行为是不切实际的。

三 最后的流放:没有选择的选择

尽管作品展现了主人公们在面对“轻”与“重”的生存

选择时的不确定性,不少评论家却认为昆德拉在小说最后一部分暗示了自己的倾向。苏珊摩尔宣称,托马斯和特蕾莎最终都“找到了精神上的满足和宁静”^{[7]P219}。一方面,他们幸福地发现自己前所未有地感受到对彼此的爱与责任,感受到每一天的生活常规(重复)都充满了意义。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在远离了极权的媚俗社会之后充满了田园牧歌般的美好:“没有人嫉妒他们;没有人打扰他们……也没有人威胁到他们的言论或行动自由。”^{[7]P219}如果单从这一层面来解读昆德拉,我们也许会认为,通过展现这一种田园般的宁静生活,昆德拉给出了自己对于“轻”与“重”这一矛盾的看法:如托马斯与特蕾莎,人们可以在社会主义的“天堂”(如集体农场)中实现责任与自由的统一,收获幸福。

但是,这样明确地给出答案显然并非昆德拉的写作风格。作为一个擅长运用各种创造性手法来质疑自己的写作主题的作家,他更倾向于留下一个开放式结局供读者想象。所以,如果我们细读“卡列宁的微笑”这一部分,就会发现,事实上,他所描述的那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其实是一种假象,在这一假象背后隐藏着各种未知与挣扎。当我们为托马斯和特蕾莎那看似正确的选择(回到乡村重获自由和生命的意义)而拍手叫好时,其实忽视了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回到乡村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这再一次地体现了存在主义的思想。正如塔洛克所说,“人被抛到世界上”,人们无法自由地选择或拒绝自己在世界上的存在,只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态度。^{[2]P41}因此,托马斯和特蕾莎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他们究竟如何生活?

与苏珊不同,我认为托马斯和特蕾莎并未在小说的结尾获得幸福或宁静,而是依然对自己的生存选择持有不确定的态度。首先是特蕾莎,当她一开始和托马斯远走高飞来到乡下一起生活时,感受到莫大的幸福。然而,当她发现陌生人给托马斯的来信时,她武断地认定是托马斯在乡下也有了情妇,于是开始拿他的不忠来折磨自己。除此之外,她还认为是自己毁了托马斯的前途:因为她,托马斯才从苏黎世回到布拉格;因为她,托马斯才离开了布拉格;他们才无路可走,不得不躲到乡下。至于托马斯,在乡下,他的医疗事业不被准许。于是,他成为了一个在集体农场开卡车的司机:他老了,“头发花白,精疲力竭,再也握不住外科医生的解剖刀了”^{[2]P371}。不仅如此,他开始反思自己拒绝见儿子、拒绝关心儿子的做法是否正确。从这一层面上看,托马斯和特蕾莎都似乎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并憧憬着另一种可能。两人在集体农场的自由和满足成了他们最后的流放,如此看

来,我们还能认为昆德拉暗示了他对托马斯和特蕾莎的最终选择的肯定吗?

其实,从小说中,我们永远无法知晓托马斯和特蕾莎逃到乡下的选择是否正确。我们所能确定的是,小说的结尾是个悲剧,毕竟两人最终因车祸死于这个看似田园般宁静自由的地方。他们最终的归宿——“集体农场”,没有带来崭新的更好的生活,而是象征了死亡和毁灭。^{[7]P220}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即使存的终点是虚无,人类还是应该自由地通过其行为和态度将某种意义赋予这个无意义的世界并探索自身存在的可能性,不管这一种存在是以“轻”还是“重”的方式来呈现。而在肯定人们自由勾画人生轨迹和充实人生体验的同时,昆德拉似乎也在极力表达他的怀疑态度。一方面,通过对几位主人公自由进行人生选择的过程的呈现,他强调个体主观性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由于生活直线前进无法重来,人们无从比较,无法知晓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正因如此,昆德拉向读者展示了人类生存选择的多种可能性,并将结局开放给读者思考,由读者通过解读各个人物的生存选择而做出各自的评判。

参考文献:

- [1]Kussi, Peter. Milan Kundera: Dialogues with Fiction[J]. *World Literature Today*, 1983, (5).
- [2]米兰·昆德拉.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 许钧,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 [3]Kimbrell, Gregory. Existential Investigation: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and History[M]. *Chrestomathy: Annual Review of Undergraduate Research at the College of Charleston*, 2002.
- [4]Tulloch, Doreen M. Sartrean Existentialism[J].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952, (2).
- [5]郭毅.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女性世界——昆德拉笔下两个女性探寻自我存在的人生体验[J]. 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9, (6).
- [6]吴卫华, 陈艳丽. 走向本真的生命——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看昆德拉对人生方式的探讨[J].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6, (6): 58.
- [7]Pichova, Hana. The Narrator in Milan Kundera's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J]. *The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Journal*, 1985, (3).

(责任编辑:周欣)